

欧洲 18 世纪均势隐喻的演变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

孙健翔

内容提要 权力的平衡是一种公认的隐喻表达,经典力学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18世纪的均势隐喻发生了巨大变化,均势隐喻的嬗变既取决于控制相对权力兴衰的军事经济动态,也取决于基于宇宙学之下规则和论述的建构,新的宇宙学建构使得权力政治和均势政策合法化和自然化。这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智识的增长和进步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伴随新的国际秩序诞生,这一本体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的隐喻不仅代表了彼时国际政治的特征,更代表了启蒙运动对科学的信仰,以及在唯物主义自然哲学下人类对自己控制世界和未来的信念。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均势 隐喻 牛顿—笛卡尔式 国际关系本体论

随着全球政治的日趋不确定及自然科学、新唯物主义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经典物理学中的“关系”。近年来,国际关系“在牛顿式本体论中的沉

* 孙健翔: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邮编:210063)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睡”开始被“关系转向”(the relational turn)的学术潮流所唤醒,有学者提出要转变“牛顿—笛卡尔式”的国际关系本体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提出建构主义理论和量子社会学,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教授提出国际秩序“熵”(Entropy)的隐喻,大量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和关系转向的论述都在力图改变“牛顿—笛卡尔式”的国际关系本体论。^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论述中,“简单的物理系统”“旧牛顿主义”“牛顿力学的思维定式”“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投射”等认为现有国际关系本体论是牛顿主义的描述十分常见。长久以来,国际关系学者接受的是牛顿主义的思维训练,习惯了规律和权力平衡带来的稳定。例如,大卫·休谟宣称均势原则调节国际政治,并提出一套有关国际法和外交准则的理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将国家的行为与煤气箱里无规则运动的分子相比;新现实主义则将国家类比于物理学中的“质点”,国家的强弱被想象为与它们所拥有的权力(即质量)成比例。^②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单一本体论基础之上,在体系层次上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更接近物理系统的简单系统。^③虽然这些有关关系转向的探讨对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挑战。^④但是,鲜有学者说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起源以及它是怎样演进并影响今天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和“关

① 参见 Laura Zanotti, *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 Agency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N. J. Rengg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64-165; Justin Rosenber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is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0, No.2, 2016, pp. 127-153; M. Kurki, “Relational Revolution and Relationality in IR: New Convers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1, pp. 1-16; M. Kur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lational Unive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A. Bousquet and S.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4, No.1, 2011, pp. 43-62; [英]贾斯廷·罗森博格:《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第4—21页;冯玉军:《对深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几点方法论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第58—64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祁昊天、方长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美]兰德尔·施韦勒:《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49页;尚会鹏:《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24—43、156—157页。

②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何曜、任晓:《均势理论反思:兼论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论》,《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104—120页; [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尚会鹏:《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第24—43、156—157页。

④ 陈纳慧:《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本体论的演进与方法论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第37—61页。

系”的?^①

18 世纪均势概念的形成与物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现实的国际政治也影响着均势概念、政策的发展。科学史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从长时段的历史观点来看,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诞生于科学革命的新现象,而是和科学观念本身一样古老。^②“社会科学”一词产生并流行于 18 世纪末,同时 18 世纪也是政治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等哲学家开始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来探究认识论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科学哲学思想,为科学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③同样,国际关系学科在 18 世纪也经历了一个关键阶段。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博伊尔、牛顿等人将哥白尼的洞见转变为机械论、唯物主义和法治的宇宙形象。正是这一形象使得权力平衡话语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从 1700 年到 1815 年间支持了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变化。^④休谟在其《论均势》(*Of the Balance of Power*)中对均势做了一个分析论证,对此,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18 世纪的人以一种认真的方式构建均势并将其发展为一整套的国际关系理论。”^⑤不仅是休谟,像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法国的费纳隆(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小册子作家”(Pamphleteer)都对均势概念进行了阐述和评论,^⑥尽管这些评述有时逻辑并不能很好地自洽,甚至难以析出一个完整的均势逻辑,但这样的学术现象确实反映了 18 世纪是均势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黄金时期。

均势概念的出现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它不仅是对国际政治的开创性解读,同时也代表了人类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变革。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科学自 17 世纪发端至 19 世纪末被巩固的这段时间内一直深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经典物理学是这一时期最富声望的科学。^⑦均势理论的发展史就是国际关系本体论的阶段性演变。18 世纪的经典物理学及其世界观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不仅

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宾利·艾伦(Bentley B. Allan)教授是第一个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参见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美]I. 伯纳德·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序言 vii。

③ 陈小鼎:《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及其前景》,《欧洲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39—151 页。

④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75.

⑤ 陈志瑞、周桂银、石斌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1 页。

⑥ 小册子作家是指分发未装订的小册子以供大众阅读,以此来传播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抑或鼓励大众投票支持特定的政治家。

⑦ [美]亚历山大·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第 12 页。

停留在隐喻的层面,更是深层次影响着后世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18世纪的欧洲不仅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起源,更是以宇宙学认识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叙事的起源,即18世纪均势理论与思想是“牛顿—笛卡尔式”的国际关系本体论的起源。学界对于18世纪均势的研究比较多,对这一时期均势所暗含的牛顿宇宙观不少学者也在论文中提及,^①但是,这些论述多是历史与理论(或政策)的二元分析,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以及均势在哲学层次上的本体论意义。^②因此,有必要研究18世纪自然科学对“权力平衡”的深远影响,而这种互动的研究需要寻找一个线索或是媒介,以此才能深入地探讨这种“平衡”的演进。

实现自然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跨越与互动,最初级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就是隐喻。人们通过隐喻性的思维方式来把握抽象世界、构建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也不例外。^③一些学者认为隐喻与建立可理解性的想象有关。^④正如美籍德裔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教授所指出:通常而言,政治语言是由伦理、艺术、哲学、宗教、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的术语汇合而成的,而政治学对这些领域的贡献却很小。^⑤隐喻是沟通自然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均势概念演进和国际关系本体论形成的重要线索。在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问题做出专门研究并试图描述其内涵与本质的学者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隐喻是根据类比原则所作的隐形比较(implicit comparison)。^⑥在当代,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隐喻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对隐喻概念的理解已经走出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局限,隐喻成为语言哲学、

① 参见 H.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ight,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54-170; A. Vagts, “The Balance of Power: Growth of an Idea,” *World Politics*, Vol.1, No.1, 1948, pp. 82-101;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London: Longman, 1993; Edward V.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比较新的研究参见 Laura Zanotti, *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 Agency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loring the Crossroads*, Routledge, 2019; M. Kur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lational Univer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林民旺:《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国际论坛》2007年第2期,第15—19页。

④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Heikki Patomäki, *Af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Michelle Le Doeuff, *The Philosophical Imaginar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9。

⑤ A. Vagts, “The Balance of Power: Growth of an Idea,” *World Politics*, Vol.1, No.1, 1948, pp. 82-101。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束定芳主编:《语言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414页。

科学哲学以至认知科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① 德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诠释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拷问大众启蒙的可能性。他又通过隐喻告知大众要回到原初生活世界的事实本身,认清理性哲学的限度,明晰哲学生活方式(洞外求真)与政治生活方式(洞穴生活)的根本冲突。^② 一些学者认为隐喻与建立可理解性的视野有关。^③ 在政治学中,隐喻具有极其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地位,研究隐喻的语言学家匈牙利罗兰大学佐尔坦·科维切斯(Zoltán Kövecses)教授认为,隐喻根植于西方文化中且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在表达中,在政治语言中隐喻更是无处不在。^④ 例如,现实主义理论依靠的最根本、最持久的隐喻就是国际社会是一个“自然状态”的社会。这一隐喻来自霍布斯,后成为所有现实主义者思考的起点。^⑤ 汉斯·摩根索在论述权力的平衡时就意识到均势和医学、物理学之间的联系,并且认为追求平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⑥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M. S. 安德森(M. S. Anderson)指出,“平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隐喻,它是指相互抵消的竞争力量的对立,从而使它们所作用的主体的位置或状态保持不变。^⑦ 而针对国际政治学中的平衡隐喻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表面上看“权力的平衡”是一种修辞,但当人们接受均势是一种隐喻,并且人们也接受隐喻有能力改变一个概念的既定含义,那么,重要的含义随之而来时,这个概念就会变得更加有趣。^⑧ 美国威拉姆特大学教授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P. Marks)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隐喻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在整个国际关系文献中,所研究的内容都是用隐喻来表达的。在详细梳理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隐喻后他得出结论:虽然隐喻在国际关系理论(或任何理论)中的作用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隐喻是国际关系叙事解释的主要元素之一。^⑨

① 郭贵春:《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一种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视角》,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高山奎:《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128—135 页。

③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Heikki Patomäki, *Af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Politics*; Michelle Le Doeuff, *The Philosophical Imaginar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9.

④ Zoltán Kövecses,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林民旺:《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第 15—19 页。

⑥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222 页。

⑦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London: Longman, 1993.

⑧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

⑨ Michael P. Marks, *Revisiting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2; Michael P. Marks, *Revisiting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国内研究者延续了上述的观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的隐喻,探讨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存在的隐喻。例如,新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隐喻为“纯粹竞争的市场”,新自由主义则将国际体系隐喻为“市场失灵”的市场,而建构主义则将国际体系隐喻为社会。^①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系朱听昌教授认为“均衡”与“均势”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且“均势”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中而且体现在国内政治。^②

本文首先依托国际关系本体论现有研究成果对“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概念进行界定,解释其名称缘起、主要特征。然后,依托国际关系隐喻理论研究成果论证隐喻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起到的媒介作用。在界定概念和框架后,本文将运用欧洲均势史和均势概念史的研究成果,通过隐喻的框架分析均势内涵的演进,重点分析18世纪均势概念的演进,阐明均势内在科学隐喻的发展是如何将经典力学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又是怎样影响现实国际政治。最后,提出一些对“牛顿—笛卡尔式”本体论的思考。

一、“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概念界定

国际关系的学科史也可以被看作是“科学革命阶段的曲线发展史”。^③ 17—19世纪,被当代社会科学或宽泛意义上社会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奉为思想基础的探索都建立在物理学、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如霍布斯、休谟、斯密等思想家的发现和创造。经典世界观依然对社会研究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本体论起主导作用。^④ 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本体论是牛顿式的或是牛顿主义的。实际上,在国际关系本体论的研究中笛卡尔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对18世纪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就指出许多外交家的“牛顿—笛卡尔”主义倾向,例如,奥地利国务大臣考尼茨(Wenzel Anton Fürst Von Kaunitz-Rietberg)独特的外交方法“政治代数学说”(Political Algebra)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笛卡尔主义。^⑤ 纽约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Benedict Kingsbury)则认为,格劳修斯的国际法思想与笛卡尔主义有着紧

① 林民旺:《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第15—19页。

② 朱听昌:《试论西方均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国际论坛》2004年第6期,第1—4页。

③ 杨广:《科学范式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的重构》,《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1卷第11期,第69—76页。

④ [美]亚历山大·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译者序,第2页。

⑤ 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18.

密联系。^① 瑞典国防大学教授安托万·布斯凯(Antoine Bousquet)和东英吉利大学教授西蒙·柯蒂斯(Simon Curtis)则指出:(复杂性思维等)概念都是在自然科学的特定背景下针对特定问题或谜题而产生的,并逐渐积累和扩散,直到它们共同对笛卡尔、牛顿和科学革命相关的主导科学范式构成了强大的挑战。^② 虽然在牛顿主义和笛卡尔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③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是这两种科学哲学和思维模式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影响,即“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来源于国际关系学科以及西方政治思想中普遍存在的本体论想象,这些想象大体上依赖于笛卡尔的物质二元论以及牛顿物理学的本体论假设。因此,在梳理并综合学界有关这一本体论的论述后,本文将受经典物理学影响的国际关系本体论统称为“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

“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实体主义**。在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想象中,人类主体在逻辑上与物质分离。“牛顿—笛卡尔”传统认为物质是同质的、惰性的及可延展的,是易于被塑造以服务于理性思维目的。这种在牛顿物理学的基础上强调世界是具有稳定特征的实体组成,且实体之间存在外部性关系的认识被称为实体主义。^④ 实体主义的分析本体论基础(ontological primitive)是“事物”(things)或“实体”(entities),实体存在于互动之前,所有关系都应被视为实体之间的关系。^⑤ 启蒙运动时的本体论完全接受了希腊原子论,即现实是由具有明确特征(原子)的物质实体构成的。这导致了基于机械模型理解现实范式的发展。^⑥ 对牛顿来说,世界是由“无限小、无限坚韧、永不改变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本身无需进一步解释”。由于牛顿力学将这些“质点”作为其出发点,牛顿力学能够将这些质点的复杂结构运动简化为简单的运动定律。正如不来梅大学教授朱利尼(Do-

① Benedict Kingsbury, "Grotius, Law and Moral Skep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ought of Hedley Bull," in Ian Clark and Iver B. Neumann, eds.,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6, p. 46.

② Antoine Bousquet, Simon Curtis, "Beyond Models and Metaphors: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4, No.1, 2011, pp. 43-62.

③ 笛卡尔的机械论自然观受到同时代制钟技术的影响,与当时的机械技术存在直观的类比,没有从力学、运动、时空等科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自然。牛顿主义对笛卡尔主义既有继承也有不同,牛顿需要在笛卡尔设想的几何空间中来让加速度变得合理,不过牛顿又对时间和空间做出了区分,即空间是一个三维连续区,时间是一个一维连续区,从而割裂了时间和空间。

④ Laura Zanotti, *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 Agency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

⑤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3, No.2, 1997, pp. 281-317; P. T. Jackson and D.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5, No.3, 1999, pp. 291-332.

⑥ Laura Zanotti, *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 Agency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menico Giulini)指出的,“如果一个人采用简单原子主义的观点,他甚至可以推测所有物理现象最终都可以简化为力学定律”。^①“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其实体主义特征。可以说,现在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实体主义的。实体主义的本体论假设深刻地塑造了国际关系学者想象施动者、道德、知识的方式,以及如何设计和评估外交政策,加深了国际关系理论普遍伦理和政治施动的理解。在信赖“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理论家想象中,世界是由稳定的实体、具有原子分离性的主体和线性因果关系组成的。这种对实体主义的分析或本体论的信赖跨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传统划分,包含了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主流“范式”中的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以及一些批评理论,如治理研究的流派(建构主义是一个例外)。^②国际体系被理解为“可以推断国家行为的封闭体系”。在理论构建上,它们假设实体先于互动,或者实体在与其他实体建立社会关系之前其本身已经是实体。这些预设实体中最常见的单位就是“国家”,也有学者将国际关系基本单元设定为“个人”或“族群”,但基本的运动模式是相同的。首先,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将基本单元置于国际关系的封闭空间内,然后,单元在体系中就像桌上的桌球一样被投入运动,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就是人们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观察到的“模式”。牛顿物理学的本体论出发点和笛卡尔式的“思维”和“广延”分离,对于塑造包括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国际发展在内的国际干预的设想、论证和实施方式至关重要。^③

2. 外部性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所谓外部性关系是指在全球政治系统内国家的内部因素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国际关系中,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作为行动者”的假设上,但国家中心主义有更微妙的影响。例如,主权领土使人们很容易想象社会生活是发生在有边界的容器内。正如国家具有实体的性质一样,包含在其中的社会也被认为具有实体的性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理查德·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认为,“西班牙”社会和“英国”社会作为聚合的、可比较的单位的想法是随着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逻辑使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设想受规

^① Domenico Giulini, *Special Relativity: A First Encoun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

^② 亚历山大·温特和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都成功地挑战了实体主义本体论和牛顿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即“push and pull”的线性关系。详见:Alexander Wendt,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Unifying Physical and Social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 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Laura Zanotti, *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 Agency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

范、规则和结构约束的封闭社会。^① 如果没有这种世界的时空秩序,就很难约束社会关系。按照这条思路,主权国家覆盖和约束社会世界的概念也使人们有能力谈论支配性社会结构,这些结构制约着个人的思想遵守或偏离这种有约束的社会秩序——这一模式反映了主权权威的主张。^②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埃米尔巴耶借鉴了约翰·杜威和美国政治学家亚瑟·本迪(Arthur Bendey)的理论,发展了两种形式的实体主义的类型学——“自我行动”和“相互行动”。^③ 在自我行动的方法中,假设事物以其自身的力量行动。“自我行动”视角既包括当今对行为的理性选择解释,也包括“显然是理性选择模型的主要对手”的内部规范驱动方法,无论分析取向是针对自我行动范式中的“想法”还是“利益”,实体都具有引导其通过自我激励、目标实现行为的基本特征。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自我行动”方法通常具有理性选择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更普遍的是实体主义的交互作用的变体。互动理论认为,社会行为应该在“因果关联”的层面上进行考察。^④ 简言之,实体主义的互动形式假设“实体不再产生自己的行为,而是相关的行为发生在实体之间”。实体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始终保持固定不变,每个实体都独立于其他实体的存在,就像桌球或牛顿力学的粒子一样。^⑤

3. 线性因果关系。牛顿的运动定律第一次试图建立一个解释地球内外模式以及普遍原则的体系。牛顿第一、二定律提供了如何从牛顿角度理解世界的关键。它们规定了“每个物体都能保持其静止状态或直线匀速运动状态,但受外力强迫改变其状态的情况除外”,以及“物体加速度的大小跟作用力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且与物体质量的倒数成正比;加速度的方向跟作用力的方向相同”。这些旨在解释运动的原理以欧几里得空间为前提,它定义了几何空间的拓扑和精细性质。^⑥ 牛顿最重要的发现与物理论证的几何性质有关,他的定律假设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他也知道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他只能以间接实验方法证明这些假设的有效性)。牛顿本人并不认为这些

①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 Reinhard Bendix, *Kings or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② P. T. Jackson, D.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291-332.

③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No.2, 1997, pp. 281-317; John Dewey and Arthur F. Bentley, *Knowing and the know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9.

④ John Dewey and Arthur F. Bentley, *Knowing and the Known*, p. 108.

⑤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pp. 285-286.

⑥ 欧几里得空间(Euclidean space)是指一类特殊的向量空间,对通常三维空间 V^3 中的向量可以讨论长度、夹角等几何性质。拓扑(Topology)是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一个学科。它只考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和大小。

应该有特定的线性坐标,但他的运动定律假设运动必须与绝对空间和时间有关。^① 因此,鉴于支持这一元叙事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动态性,由于还原论模型假设所有物理现象都以渐进的方式发生变化,并遵循可预见的轨迹,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被定位为受预期的影响。^② 施动者,国家被描绘成具有活力的单元,这种认知塑造了人们对施动者和道德的概念化方式,验证政治行动的方式,以及想象政治是如何变革与演进。此外,通过关注抽象而非实践,实体主义本体论想象促进了为政治行动辩护的方式,最终转移这些行动本应为实际后果所承担的责任。^③ 对国际关系也存在着一种想象,这种关系以牛顿的方式被设想为“事物”相互作用:要么以重复的循环(现实主义),要么以更线性、渐进的规则模式(自由主义者)。^④

对于解决主体结构问题的时间顺序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们将线性的、渐进的时间作为某种派生的东西引入到社会现实的构成中。^⑤ 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支持“外部的世界”的“牛顿”观点,认为“外部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由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最大化。近些年来,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关注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出发点是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本体论多元论的严重缺失。^⑥ 由于还原论模型假设所有物理现象都以渐进的方式发生变化,并遵循可预见的轨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被定位为受预期的影响。这种“原子论本体论”主张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可量化和可预测的。^⑦ 持这一立场的规范性原教旨主义使国际关系适应了一种持续性思维,这使得它很难处理机会、变化和不确定性。因此,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国际”是本体论和历史建构的产物,具有重大的认知和伦理影响。

4. 欧洲中心主义。国际关系主流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可以在“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中得到解释。根据牛顿观点的原子论本体论,国际关系规定了“帝国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在单一思维

① Milja Kur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lational Universe*, p. 43.

② Emilian Kavalski, “Inside/Outside and Around: Complexity and the Relational Ethics of Global Life,” *Global Society*, Vol.34, No.4, 2020, pp. 1-20.

③ Laura Zanotti, *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 Agency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

④ *Ibid.*, p. 131.

⑤ P. T. Jackson and D.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291-332.

⑥ Emilian Kavalski, “Inside/Outside and Around: Complexity and the Relational Ethics of Global Life,” *Global Society*, Vol.34, No.4, 2020, pp. 1-20.

⑦ Milja Kur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lational Universe*, p. 107.

模式下,它在全球范围内是可知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是可管理和可治理的”。^①所有不属于国际关系“授权想象”的东西都被蔑视为原始的、神奇的和万物有灵论的,因此,被剥夺了合法性并被忽视。^②国外的国际关系思想家、理论家从孔德缔造实证主义哲学起就探索宇宙学结构对于国际体系的映射。他们想象了在欧洲这片土地上人们、社会或宗教对宇宙“有序”性质的信仰。但是这就也导致了现有“牛顿—笛卡尔式”的国际关系本体论是建立在西方背景之下而忽视了非西方的存在,这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现有本体论越发不能适应全球政治的因素之一。在非西方世界中同样存在着“平衡”思想并成为文化的核心内涵,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起源的西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英美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抹杀”其他宇宙学的趋势。^③

二、隐喻:国际关系本体论演进的线索与媒介

现有国际关系本体论本身就是在国际关系学与物理学的互动中演进而来。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表明,隐喻对人类的思维和交流至关重要。隐喻唤起人们对已知事物的想象,激发人们对研究主题的新理解。^④在学术研究中,隐喻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以定义问题,划定分析范围,并提出检验理论命题的假设。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结构”“权力的平衡”和“分析层次”等,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隐喻,这些基本隐喻所反映的是“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因此,隐喻不仅是均势的一种分析框架更是国际关系本体论演进的关键媒介和线索。

在语言学中,隐喻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A是B”法则,例如,爱情是一场旅行。当从旅行的角度来思考爱情,隐喻就发生了。认知语言学中关于“隐喻”

① Janet Conway and Jakeet Singh, “Notes from the Plurivers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2, No.3, 2011, pp. 689-704; Emilian Kavalski, “Chinese Concepts and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E. Aydinli and G. Biletkin, eds., *Widening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104-122.

② Emilian Kavalski, “Inside/Outside and Around: Complexity and the Relational Ethics of Global Life,” *Global Society*, Vol.34, No.4, 2020, pp. 1-20.

③ Milja Kur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lational Universe*, p. 28; Stephen Chan and Peter Mandaville, and Roland Bleiker, *The Ze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ory from East to Wes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Emilian Kavalski, *The Guangxi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Amaya Querejazu, “Encountering the Pluriverse: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in Other Worlds,”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59, No.2, 2016; David Blaney and Arlene Tickner, “Worlding, Ont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Decolonial IR,” *Millennium*, Vol.45, No.3, 2017, pp. 293-311.

④ P. Michael, Marks, *Revisiting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1.

的定义是用另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来理解一个概念域。参与概念隐喻的两个领域有着特殊的名称。我们从中提取隐喻表达来理解另一个概念域的概念域称为源域(Source Domains),而以这种方式被理解的概念域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s)。^①从概念源隐喻(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概括是,概念隐喻通常以更抽象的概念为目标,以更具体或物理的概念为源域。在“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中,^②源域为目标概念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知识结构。结构性隐喻的认知功能是使说话人能够通过源B的结构来理解目标A,这种理解是通过A元素和B元素之间的概念映射(Mapping)实现的。科维切斯教授梳理了常见源域和目标域,常见的源域中有物理学“力”(forces)的概念借此来分析诸多抽象目标域,其中包括政治领域。米歇尔·马克斯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许多早期隐喻都属于故意隐喻的范畴,目的在于对正在研究的事物产生意识或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隐喻与类比只有一步之遥,类比是使世界变得易懂的一种相关但略有不同的方法。类比涉及两个相关的理解领域,并对它们进行直接比较,以突出它们的相似性。隐喻采用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突出一个关键的相似性,然后将其从源领域嫁接到目标领域,作为理解一个问题的一种方式。隐喻依赖于语言的性质来刺激与类比相同的心理联系,但它们不是使用逻辑模型,而是利用大脑通过词语将经验转化为认知联系的能力。^③毋庸置疑的是,基于均势诞生时的物质生活和知识生活,“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隐喻。隐喻作为一种媒介或者工具联系了国际关系学和物理学,这种联系也确定了影响至今的“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换言之,隐喻的源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本体论。

就国际关系而言,“权力平衡”的隐喻帮助最早的国际关系思想家理解了国家的“力量”且建构了结构式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利特尔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权力平衡”的隐喻表达与修辞格采取相同的语言形式,当人们接受均势是一种隐喻,这个概念也随之丰富。^④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隐喻会成为歧义和混乱的来源,应该在政治语言中避免使用隐喻。这种批评经常延伸到国际力量的平衡,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概念经常被认为是模糊且没有意义的”。^⑤英国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在其经典的欧洲外交史著作中严

^① Zoltán Kövecses,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② *Ibid.*, p. 37.

^③ Michael P., Marks, *Revisiting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94-195.

^④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p. 19.

^⑤ *Ibid.*, pp. 21-22.

重依赖均势的概念但又未能定义这个术语,因此泰勒被批评道:“(这些作者)得益于这样一个原则(均势),即很难证明有事物不符合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①对此,许多学者对均势进行了定义以重新明确“均势”的使用域,抽掉隐喻联想的概念并赋予其一个明确的含义。^② 美国历史学家、布兰迪斯大学荣休教授弗兰克·曼努伊尔(Frank Manuel)指出,“所有的国际政治词汇都是对那个时代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语言的改编”。^③ 均势一词虽然从词形上没有改变,但是其本体论却不断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关于隐喻还有第二种更为积极的观点。这种观点坚持认为隐喻在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隐喻有能力转换一个既定概念的含义,它们在理解世界上新的或我们不理解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均势的概念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与现代的出现密不可分。人们长期以来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受到质疑,因此有必要制定新的世界思维方式;也正是在这时,权力的概念领域开始被理解为平衡的概念领域。隐喻的效果是改变了既定的权力等级含义;它重塑或重新配置了人们对权力的传统理解。^④ 马丁·怀特则发展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体系本质上是模糊的,因此需要捕捉这种模糊性的隐喻。他认为,“平衡”隐喻的模糊性和可塑性是一种优势进而我们可以求助于它,因为它足够灵活和有弹性,足以涵盖国际体系中遇到的所有复杂性和矛盾。^⑤ 均势的隐喻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优势,其最有价值地方在于它帮助了世人理解权力,即使是在定量分析科学方法不充足的近代社会,它仍能借助于来自更熟悉的概念来理解复杂的、抽象的乃至非结构化的“权力”概念,给予政治学极大的内在发展动力与活力。由此可见,隐喻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它们被像实证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提供了重要的模型源域,而是在于它们被社会行为者习惯地使用,并且它们为这些行为者如何理

①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24.

② 关于均势的定义参见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2;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H.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Frank E. Manuel, *The Age of Reas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114.

④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p. 23.

⑤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p. 28; H.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50.

解现实的本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①

“Balance”的隐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历史语境性,它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业术语,在欧洲大陆启蒙运动中受到物理学的影响转变了隐喻的内涵和解释领域(从商业术语到政治学),而后人又在现实政治的不断发展中利用这个术语完成自我的政治目的。从理论和思想的角度而言,均势内涵是否发生转变是一个语言学与哲学的转向问题。马科斯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隐喻历史是由与类比模式相似的隐喻向只基于概念映射的隐喻转变的历史。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许多早期隐喻和类比相似,它们都是有特定目的的语言学模式。从生物学或机械学角度达到一种想象力的平衡,是隐喻来源于类比推理的有力证据。随着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治国方略向更为独立的学术研究的转变,语言中暗含的隐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意味着,隐喻不是来自类比推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通过借用不相关领域的语言意象,以隐晦的隐喻方式被思考。隐喻作为概念转变上的媒介帮助早期思想家建构了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本体论,这也成为探寻国际关系本体论演变的关键线索。另一方面,隐喻内涵的转变还可以从“范式/科学革命”进行解释。科恩指出:“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②新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均势理论家原本的预期,使人们感受到反常;新的观念与概念认知逐渐突现,一段时间后,人们意识到需要对均势概念范畴等进行调整,直到反常现象变得“正常”。理论的增加和变化是危机的信号,而新理论的出现恰恰是对危机的回答。^③

三、17世纪均势隐喻发展的停滞

尽管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才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出现了均势政策和正在运行的均势体系,但非系统均势思维可能追溯更远。^④ 诸如大卫·休谟这样的学者认为,均势在古典时代就已然存在,他们的论述依据主要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休谟断言,均势原则就是不论出于“嫉妒性的竞赛”还是“审慎的政治”,共同的效果都是“每一个占据优势的强国必然会遭到一个联

①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p. 52.

② [美]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③ 李莹、季梵:《关于库恩范式理论的几点思考:从〈科学革命的结构〉谈起》,《新疆社科论坛》2019年第5期,第108—112页。

④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p. 24.

盟的反对,并且经常是由它原先的友国和盟邦组成的。”^①

在以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圭恰迪尼为代表的作家那里,将 1648 年前的均势隐喻源域归纳为三种:1. 天平(scales);2. 复式簿记(double-entry book-keeping);3. “对位法”(punctus contra punctum),即音阶和谐以及绘画中的几何空间。对此,17 世纪以前的均势思想出现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意大利提供了均势思想生长的土壤,特别是国家作为“体系”的一部分,并在“体系”中运作的想法是其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圭恰迪尼在其历史著作中描述的意大利的方式影响了后世历史学家,使他们接受了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均势体系。正如一些现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平衡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神话,但它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也为后世思想家的均势思想合法化打下基础。特别是,圭恰迪尼提高了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声誉,在后者的领导下,佛罗伦萨在当时已经成为意大利城邦体系中的“平衡之指针”(the tongue of the balance)。^②其次,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使得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崩塌与欧洲社会世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在中世纪,欧洲人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即整个宇宙被视为一个等级制度,上帝处于最高点,人类是罪恶和卑微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其最高的世俗和精神领袖按照上帝的教导进行统治。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文艺复兴中松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打破了中世纪社会的僵化和分裂,开创了世俗主义的发展趋势。教会的统治地位被打破,宗教改革的开始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③从上到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被打破,欧洲人看待宇宙的角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将这种宇宙观投射到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最后,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印刷术的进步使得关于“平衡”思想的艺术作品、书籍文章可以流通,“平衡”的智识得以传播。在 1450 年左右,印刷术首先在美因茨得到完善,在其后 50 年的时间里,欧洲的印刷机生产了大约 600 万本书,有学者称“可能比罗马沦陷以来西欧生产的书还要多”。^④

16 世纪到 17 世纪初,这一期间虽然诞生了均势的隐喻,但均势思想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虽然使用从数学和几何学中提取的隐喻有助于将权力平衡概念运用在国际关系的基本描述上,但那时的作家们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平衡

^① David Hum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5; 中文版可参见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01—109 页。

^②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p. 32.

^③ Ibid., pp. 44-45.

^④ E. F. Rice and A. Grafton, *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1450-1559*, New York: W. V. Norton, 1994, p. 7.

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对国际关系性质的描述,或者作为政治家的准则和指南,提供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规则和政策。^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尽管知识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平衡术语进入国际政治词汇的速度很慢,因为如果“Balance”要成为国际政治术语时就意味着高度简约化。因为天平的术语来源于物理科学,所以在这样的隐喻语境下总是有一种倾向(这在18世纪会变得特别明显),即讨论联盟极具公式化(均势理论家们会将平衡的概念投射到国家间,认为小国实力的相加作和可以大于或等于大国的实力,这“相加”的过程就是联盟)。此外,由于历史的因素,政治思想家们乐于将各种冲突归结为二元对立(如法国和哈布斯堡之间的斗争,基督教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斗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而两极模型也足够形容与解释最早流行的大国平衡体系。例如,法国和哈布斯堡之间的斗争,基督教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斗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如果将1648年之前称为均势思想的初创期,那么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则是均势思想的生长期。先前关于均势政治起源的研究已经确定了许多重要的促成因素。其中许多因素出现在16世纪,却没有产生类似的效果,而一些类似的因素在古希腊世界存在,也没有引发同样的结果。之所以这些因素在1650年后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17世纪“普遍危机”,^②这一现象本身就是16世纪所引发的各种力量的结果。^③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西奥多·拉布(Theodore Rabb)指出,“普遍危机”涉及对世界的认知的转变,在这些蜕变过程中,在一个一切都陷入怀疑、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的世界里,人们的基本担忧仍然是一样的,一个人能否获得保证、控制,并共同接受某种似乎遥不可及的结构?^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引发了权威危机,这两种现象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欧洲是一个动荡、变化,令人激动和痛苦的时期。这一漫长时期的特点是,人们痛苦地试图接受各个领域的大量新思想,这些思想推翻了旧的中世纪确定性。^⑤此外,奥斯曼扩张同基督教文明内部的国际冲突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欧洲国际均势的发展演变。^⑥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概

① P. Savigear, “Europ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 Taylor, ed.,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ongman, 1978, p. 41.

② 指1600—1700年之间在亚欧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崩溃、政治动乱、社会瓦解、朝代更替等,由于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皆有发生,所以在史学界一般被称为“总危机”或“普遍危机”。

③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1996, p. 44.

④ T. K. Rabb,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3.

⑤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p. 45.

⑥ 宋保军、王晋新:《奥斯曼扩张与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演变》,《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第94—100页。

念在 17 世纪末蓬勃发展并非偶然,这是经过漫长知识革命和思想激荡后才出现的结果。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认为“维持权力平衡需要许多共同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权力平衡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欧洲人对政治中的必要性和好处有许多共同的信念”。^① 随着新大国的出现和联盟形成的更大灵活性,18 世纪的经典均势政治时代拉开了帷幕。

四、均势隐喻演进的国际政治现实因素

18 世纪均势隐喻的演进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的国际政治背景主要有三方面,即主权国家的出现、阻碍均势发展的限制被打破及新国家利益观的出现。

第一,主权国家的出现。1648 年后,欧洲的国际关系局势和国家观念都发生巨大改变,主权国家的诞生给 18 世纪均势的繁荣打好了基础,也给予学者想象的空间。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国家作为独立行为体的条件并不充分,一方面,宇宙学的发展没有突破中世纪的等级体系;另一方面,宗教等级体系没有给予学者以解放想象发展隐喻的空间。在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单元层次“施动者”之前,强调物体之间关系的经典物理学也不足以统治国际关系学说。只有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封闭体系中的独立行为体,牛顿宇宙学得到发展时国家才能被类比为经典力学中的“质点”,这就是经典物理学及实体主义投射的基本条件。不论从欧洲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或是这一时期的主权观念变化,均势开始成为 18 世纪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的主题。此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天平”概念自然不再能满足思想家们对欧洲国际体系的想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主权国家逐渐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行为体,行为体的数量大大增加,简单的两极平衡模型无法再描述如此众多国家之间的互动,这种现实政治必然推动均势思想走向复杂化,寻求更加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隐喻。

第二,阻碍均势发展的限制被打破。1648 年以前的均势政策受到宗教情绪的限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每个国家完全不受宗教忠诚的约束,这样的政策才能有效运作,它才能根据平衡的需要来选择伙伴。^② 1559—1648 年期间,当国际政策主要由宗教热情主导时,这种自由并不存在。总的来说,天主教国家觉得有义务支持天主教伙伴,无论是强还是弱,而新教国家支持新教

^① Martha Finnemore,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1.

^② Evan Lu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48-1815*, London: Macmillan, 1992, p. 7.

盟友忽视平衡原则。因此,在三十年战争中,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在德意志和其他地方出于对旧贵族利益的维护,主要支持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权;而新教强国,如瑞典、英国和丹麦,表面上出于宗教原因支持新教事业,实质上很多时候是为了促进纯粹的国家目的,而不是为了大陆平衡的利益。因此,在那个所谓“意识形态时代”,宗教倾向很多时候不被视为决定性因素。例如,威尼斯在1617—1618年与联合省(荷兰)结盟时,愿意忽略宗教因素以更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弗兰茨一世曾在1527年和1536年两次邀请异教徒土耳其人反对查理五世;亨利四世在1609年于利希封地继承战争(War of the Jülich Succession)中站在新教一边进行干预;而在1635年,黎塞留在一场很大程度上出于宗教因素的战争中,使被誉为“天主教之盾”的法国站在新教列强一边,以此来战胜西班牙的力量,促进法国的国家利益。总的来说,宗教联系阻碍了当时任何国家一门心思追求平衡的政策。阻碍均势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西班牙的主导地位。从1559年起,西班牙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摆在其他国家面前的真正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它?”许多不同的国家都有反对它的理由:遵循王朝竞争的法国,维护或确保独立的英国、威尼斯、联合省(荷兰),捍卫宗教的瑞典和德意志新教统治者。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各自为战,而不是结成联盟作战,更没有从大陆均势的角度来考虑。相反,奥地利出于家族和宗教原因,自动站在西班牙一边。因此,各国几乎没有选择合作伙伴的余地,也没有深思熟虑的决定将一个国家的力量置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平衡之中。这一时期,“平衡”开始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但却很少作为维持欧洲大陆平衡的政策工具。当时欧洲人还没有意识到欧洲是一个必须始终保持平衡的单一实体。这种思想在1648年之后发生改变,当时八到十个主要国家,加上许多较小的国家,能够以各种组合的方式组成集团。“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在欧洲所形成的均势格局并非是“一种神圣的稳定局面”,各国的兴衰隆替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①

第三,18世纪外交政策背后纯粹的王朝称霸动机也有所下降,新国家利益观开始登上国家间政治的舞台,新国家利益观使得国家实力可以被计算,也使得“引力”的概念得以被运用进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中。所有关于权力平衡的思考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不变的三种基本假设: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力量;权力是相对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都必须(也可以)用周边国家的权力来衡量;一个国家权力的任何增加都意味着其邻国权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页。

力的减少,并对其安全和独立构成威胁。^① 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宗教和王朝利益是主要问题。^② 然而,到了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世俗化和主权国家的出现使得宗教的重要性大大降低,18 世纪的大国真正要考虑的是对外政策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利益的内涵开始发生了转变。国家实力的要素是领土(包括自然资源)、人口(战斗力和生产力的基础)、政治组织、军备(包括军队组织、士兵素质、兵役制度、武器等)以及工商业等,且以领土和人口最为重要。^③ 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实力的增长,法国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体系的主导国家,这激发了对国家“实力平衡”的激烈讨论。“均势”的概念开始得以广泛的流行,这一特定的表达不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平衡”概念而是在欧洲政治讨论中频繁出现。对均势更有利的环境的存在反映在各国实际推行的政策中,均势联盟的组合出现了新的灵活性。该体系下的国家不再受到传统、宗教或其他忠诚的约束,而是寻求最能促进其利益的短期联盟。

由于欧洲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新的均势如同“三十年战争”后的均势一样很难维持。首先,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存在着两个主要势力之间的平衡:法国与它所反对的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而第二等级的国家则要选边站。18 世纪出现了几个崛起的大国:到 1763 年,英国、普鲁士和俄罗斯加入了法国和奥地利的老牌强国行列。自 18 世纪 50 年代起,英、法、普、奥之间的外交角逐打破了欧洲旧的政治格局,使欧洲国际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敌友的重新转换,集团的分化改组在欧洲外交史上被称为“外交革命”。^④ 其次,英法对抗的海外延伸意味着,这种平衡首次获得了欧洲以外的维度。出于这两个原因,各国间的“支持”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与此同时,英国拥有巨大的殖民地和商业财富,而其他大国的势力几乎相等,这使得均势作为一种约束更加重要,因为任何国家的任何收益都是所有其他国家所关切的。如果不能阻止一个大国取得领土,平衡原则要求其他大国获得同等收益。

五、“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

对于 18 世纪的均势,学界观点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阻止五大国实现“修正主义”冲动的不是“平衡”学说而是 18 世纪大多数政府的资源有限性,它们

^① P. Maurseth, “Balance-of-Power Think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1, No.2, 1964, pp. 120-136.

^② 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p. 138.

^③ 王绳祖:《略论均势原则在近代欧洲史上的作用》,《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第 45—51 页。

^④ 同上,第 215 页。

的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争霸性质的；他们进而论述道，18世纪仍然是一个零和游戏时代，其中一个国家的收益总是以另一个国家的重大损失为代价。^① 如果从宏观上来看，此观点确实存在着合理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结果来看五大国的均势体系是事实，而且从智识层次来讲，这种历史背景也推动了这一时期平衡的观念取得极大发展，均势观念盛行，尤其是均势隐喻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天平”的隐喻源域就已经可以看到物理学概念的身影，不过其主要局限在静力学且未被明确的说明。在当时的物理学概念中，作为测量工具的天平和天平概念更容易被纳入政治语言。^② 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中“天秤座”的象征概念曾被用来预测政治事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权力的平衡。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均势的“法国时代”，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在两极之间完成的。当国际政治由两极向三极转变时，依旧没有摆脱天平的隐喻，而是引入了“天平之舌”的仲裁者概念。政治家们划分了欧洲的一般平衡和高级平衡，例如一系列的区域平衡，这些平衡都从属于但重要于整体平衡。^③ 然而，当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权力参与平衡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是数学家所说的多重平衡，它不能用一对天平来说明和表达。^④ 权力平衡学说如何使我们或其他任何人能够确定平衡体系中包括多少国家？有哪些国家？如何分配权重以保持平衡？这些问题被重新摆在欧洲人的面前。在一个复杂的或多边的体系中，从多个权力单位相互依存的平衡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主流的思路。复杂的国际关系趋势被简单的平衡模型完全掩盖，“simple”被用于表示系统的、不灵活的双极结构，但不能够被视为对系统成员数量的任何限制。^⑤ 古典均势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均势隐喻，已经不能适应18世纪现实国际政治的复杂情况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始终探寻国际政治原则的思想家来说，他们亟需找到可替代的宇宙学解释，产生新的国际关系本体论。

18世纪的天体物理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物理学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引力的作用并使得“平衡”的概念进一步充实起来。科学革命产生了大

① James R. Sofka, "The Eigh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Parity or Pri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5, 2003, pp.147-163.

② A. Vagts, "The Balance of Power: Growth of an Idea," pp.82-101.

③ P. Maurseth, "Balance-of-Power Think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120-136.

④ A. F. Poll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No.2, 1923.

⑤ P. Maurseth, "Balance-of-Power Think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120-136.

量的隐喻以及对力学和平衡的迷恋,它解释了为什么均势思想如此强烈地呈现出来。^① 在一个以对宇宙力学的知识迷恋为主导的时代,“权力平衡是所谓强权政治机制的原则;而机械隐喻对于描述国际关系是有用的。”^② 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要想真正理解自然现象,就应该按照从总体到部分,从全部到局部的次序来看,即其宇宙论体系的核心在于宇宙是封闭的、完美的、两级分化和等级森严的。但是哥白尼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等级”宇宙观,地球不再是与天“对立”的了不起的物体,而是与其他天体一道围绕处在中心位置的太阳,和谐地分布在空中,形成同一个宇宙。行星均受到一种局部的平移运动力的推动,因此必然和这些行星一起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哥白尼的日心宇宙说不仅挑战了关于人类中心性的思想,而且挑战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社会赖以生存的整个亚里士多德宇宙学,他将自然描绘为机器科学论述能够抓住外部,将自身视为将物体简单地转化为概念秩序。^③ 因此,哥白尼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变革性,并不是因为他旨在颠覆这些信仰,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具有天文学、科学、哲学和政治意义。^④ 牛顿的宇宙模型很快被采纳为新的共识,因为它结束了欧洲人长期的智识不确定性,这个时代想要听到的是世界是和谐的、理智的;人类有着惊人的能力,有着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有序理性。^⑤ 牛顿提出了一个新的统一宇宙概念,为这个时代的宇宙运动争论找到了一个调和方案。他的宇宙运动定律用来解释地球和天体的行为,牛顿宇宙由“具有延展性、形状、数量、运动和静止的物体”组成,在这个宇宙里,时间是统一的、绝对的数学时间。这种协调的功能解释了“机械”隐喻在这一时期普及权力的平衡理论的成功之处。过去一百年的特点是宗教不和、政治动荡和战争。在 17 世纪欧洲思想的几乎所有领域中,产生了对和谐的追求,也是巴洛克时代的一个特征。启蒙运动中的文本通常将政治类比为天文学、几何学、化学、物理学、磁学、引力和其他整齐划分的科学现象,这种牛顿式的政治逻辑,强调产生“平衡”的作用力。^⑥ 牛顿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的思想满足了欧洲人对认识论的迫切需求,这种认识论将至少在未来两个世纪结束对秩序和权威来源的痛苦怀疑,而这正是过去两百年的特点。

①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p. 47.

② Bull Hedley and Holbraad Carsten, eds., *Power Politics* (by Martin Wight),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8, p. 168.

③ [法]米歇尔·布莱、埃夫西缪斯·尼古拉依迪斯主编:《科学的欧洲:科学地域的构建》,第 89—107 页。

④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91.

⑤ T. K. Rabb,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4.

⑥ James R. Sofka, “The Eigh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Parity or Primacy?” pp. 147-163.

18世纪国际关系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不可渗透的、统一的国家,正如速度、质量和引力是牛顿力学基本概念一样,国家利益、实力和权力被经过专业训练的精英们理性地计算着。^①当社会科学在18世纪逐渐发展成形时,其最大目标是建立一门人文科学,类似于牛顿物理学对自然界所做的那样,包含并解释社会的运作。普遍采用的牛顿主义方法有可能将国际关系简化为一套规则和原则,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科学,因为它们可以简化为一般原则,个人和偶然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更小,这也是这一时期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思想大师所追求的目标。^②这样“科学化”的努力也削弱了对均势的负面评论。一种新的世界观围绕着包罗万象的框架结构融合在一起,早期意大利的均势模式也可以顺利融入其中。当“引力”的概念被投射到国际政治中,国家就相当于行星,国家的物质实力相当于行星的质量,因物质实力而产生的权力则相当于行星因质量而产生的引力。自然哲学中的宇宙学转变很快在思想结构中产生涟漪,改变了经济思想、政治哲学和实际管理中的观念。^③这一时期许多外交家热衷于谈论他们在外交政策中所追求的“体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考尼茨谈到了他在外交上的“几何方法”。大量的政治文献描述了许多国家之间关系的比较,这些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非个人机制。考尼茨认为,均势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动起作用的,它是一种根植于世界本质、独立于人类控制的机制。^④所有这些类比中影响最大的是牛顿揭示的权力平衡和太阳系之间的类比。英国一位“小册子作家”在18世纪中叶断言,“我们被告知,什么样的引力或吸引力是宇宙系统的……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它的影响是明智的,就像重力一样。四十多年后,另一位科学家更明确地画出了行星系统引力和力量平衡之间的详细比较。”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认为,在18世纪“欧洲形成了一个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欧洲的国家通过它们的关系和各种利益被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每个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堆混乱的独立部分,每个部分都很少关心其他部分的命运”。经受过牛顿主义教育的梅特涅认为欧洲国家形成了“一种社会团体”,反映了“团结原则和国家间均势的应用”。^⑤而且权力平衡本质上是一个牛顿式

①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② [英]亚历山大·布罗迪编:《剑桥指南:苏格兰启蒙运动》,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

③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95.

④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London: Longman, 1993, p. 167.

⑤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p. 67.

的概念,它假设国际体系是在和平与战争的循环中演变而来的,就像一个摆动的钟摆在固定的两极之间不停地运动一样,并以国际政治根据可量化的原则运作的理念为基础。

由此,许多学者都重复了这样一个主题:18 世纪的国际体系,作为一个哥白尼式的模型,围绕着一个“力量平衡”的理念旋转,在这个理念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它的引力。^① 国家有权共同采取行动来维护平衡,且欧洲作为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所有国家的利益乃至命运都是被联系在一起,正如天体一般,而这个“引力”就是国家的“力量”。一个“构成了历史所能承受的古典均势政治的完美实验室”在 18 世纪的欧洲诞生,在学者们的想象里,国家之间静止的、两极的天平形象被运动的、多极的、引力的天体形象所替代。欧洲大陆各政治单元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欧洲国家体系”。欧洲的总秩序是牛顿的太阳学说在地球上的对应物,所有不同的国家相互制衡。每个国家都对其他实体起着一种万有引力式的推拉力作用,而这种推拉力与其规模大小一致,尽管这种推拉力在远距离发挥作用时,效果会大大减弱。^② 对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均势隐喻,这一时期的均势隐喻的“平衡”是立体的、系统的,它不单单是要求两个实体间的平衡,而是追求在一个系统中看到各个实体间的联系即“引力”,对实力过于增长的国家用联盟的手段削弱其力量并使系统归于平衡。尽管均势理论被伦理学家们批评是战争和国际关系局势紧张的源泉,^③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启蒙运动的建设性——人类对科学的信念和对控制自己环境及未来的信念。^④ 隐喻的源域决定了隐喻的目标是如何被解释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断言国家有权共同采取行动来维护平衡,且将欧洲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国家的利益乃至命运正如天体一般都是被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引力”就是国家的“力量”。可以看出无论从国家的“实力”还是天体运动的“引力”,“力”成为这个时代分析国际关系的主要单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James R. Sofka, “The Eighteen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Parity or Pri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5, 2003, pp. 147-163.

②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54-155.

③ M. S. Anderson, “Eighteenth-Century Theories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④ Ibid.

六、“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对政策影响

微观层次上,牛顿宇宙学在其诞生大约100年后带来了社会科学的革新,同时也从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家们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新宇宙学下的均势隐喻和“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主要影响还在智识界,均势的新思想和新本体论影响到统治阶级及国家决策层次还要经过中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例如,在爱丁堡大学,自然知识和数学被逐渐描述成具有文雅的学习形式和绅士般的学习成就,因此,这些学科也被认为是充分体现了学术应有的价值并倍受推崇。牛顿曾公开承认,他对重力产生的原因一无所知,同样,休谟也从洛克的著作中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包括休谟在内的苏格兰道德学家们都明确地采用了牛顿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道德哲学家也要采用自然哲学家所普遍采用的牛顿主义方法。尽管如此,牛顿主义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人的科学”的影响还是要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大得多。^①

在中观层次上,可以看到哥白尼开创的宇宙学转变通过一系列战略部署被慢慢地引入欧洲政治话语中。在这种情况下,递归制度化遵循一条横向路径,在这条路径中,跨国公司在欧洲国家之间传播唯物主义和机制?资助和推崇自然哲学的贵族阶层。^②欧洲贵族被世袭的家族关系和交流网络联系在一起,新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得以沿着这些网络传播。进而,欧洲贵族成为联通思想家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媒介而沙龙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形式。通过自然哲学家与他们的朋友和赞助人在欧洲贵族的沙龙和餐厅进行非正式接触和讨论,科学思想被引导到欧洲政治话语中。^③路易十四利用他与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关系,用认知的术语为重商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辩护。^④通过这种方式,统治者试图说服他们的法院、公民和竞争对手,国家“能够保护其人民和领

① [英]亚历山大·布罗迪编:《剑桥指南:苏格兰启蒙运动》,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

② Mlada Bukovansky, *Legitimacy and Power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7-82;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96.

③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96.

④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3-54;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01-302; Robert Wuthnow,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World System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Vol.8, No.2, 1979, pp. 215-243.

士,捍卫其企业身份和荣誉,组织合理,因此行为可能可预测”。各国利用科学宇宙学的权威,使其统治合法化,并提高其威望。大卫·休谟在法国工作时也经常参加法国贵族的沙龙聚会并传播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① 另一种中观层次的传递是通过思想家在国家政府中任职来完成的。例如,《论均势》是出版于休谟 1752 年的政论集《政治论》中的一篇文章,而 1767 年休谟担任主要处理英国与法国以北各欧洲大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包括与俄罗斯的外交事务的北方部副国务大臣。^② 休谟主张必须以一种现代的、有计划的方式来追求平衡,更加巩固了“均势”和“离岸平衡”的政治话语。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威廉·坦普尔也是知识渊博且文理兼通的思想家,对自然哲学、医学和政治思想都做出了贡献。^③ 培根在 17 世纪初担任财政大臣,坦普尔担任伊丽莎白女王的秘书。培根、坦普尔等人有意无意地将本体论、认知论和其他宇宙观引入政治话语。一些自然哲学作品也在贵族统治阶级中被广泛阅读,并在传播自然哲学思想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④ 此外,英国和法国都建立了由“绅士科学家”组成的国家科学院,他们在权力和特权的网络中传播自然哲学和平衡理念。在英国,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于 1660 年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会(The Royal Society)。在法国,路易十四于 1666 年创建科学学院。这些学院和参加实验并与阅读官方期刊的国家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研究表明,皇家学会的创始成员中有 1/3 是政府官员,国家与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学院无疑意味着国家的命令塑造了自然哲学的发展。^⑤

按照 18 世纪均势理论家的观点均势原则规定了欧洲国家的相互行动;让每个国家都受到他国的影响,无论其距离多么遥远;通过一个共同的均势原则把所有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调节整个系统的运动;在狭窄的范围内定义任何方向上可能出现的偏差,以维持这个庞大复杂系统的秩序和稳定。^⑥ 新发现的行星被发现遵守同样的运动规律,其余的行星保持在它们的各自轨道上。由此类推,欧洲世界的大国可以被看作是在国际体系中占据对应位置的行星,并以同样的宇宙学原则指导国家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迈

① [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同上,第 580 页。

③ S. L. Star and J. R.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19, No.3, 1989, pp. 387-420;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97.

④ Bentley B. Allan, *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p. 97.

⑤ Ibid.

⑥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pp. 149-180.

克尔·希恩认为,均势作为一个概念出现时有两个不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平衡是通过建立一种机制来触发针对有霸权野心的国家的联盟,从而维持体系内各国独立性的一种方法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在英国占主导地位,成为20世纪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学者对平衡概念的明确解释。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然法意义的均势提供了维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解决办法所产生的国际社会的协调框架。尽管反霸权联盟在这里也有其特点,第二个概念更多地归功于科学革命对欧洲思维的影响,并强调欧洲是一个国家体系,由一个与消失的基督教世界共同决定的社会组成。事实证明,德语世界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都遵从这种观念。这也是19世纪上半叶“协调”外交的主题。^①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冲突,首先,这两者本质上是一种微观和宏观的关系,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做出的均势政策在“体系”中的表现就是一个“平衡”体系,至今仍在倡导的大国协调(亦称大国协奏)也暗涵了平衡的思想;其次,以休谟为例,休谟既是作为推崇均势政策反对法国的推动者,但是其思想却是受到了科学革命、牛顿主义的深刻影响,为此他说应该关心整个欧洲的利益而非仅仅英国的利益。^②

至此,均势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思想潮流,按照18世纪的观点来看,均势的核心是自然被视为真正道德和自然权利的最终源泉。同时这加强了任何战争都是正当的趋势,无论战争起源如何,都可以被视为捍卫这一基本平衡的战争。这种态度认为平衡本质上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是中立的,而另一种态度认为平衡本身具有某种道德价值,欧洲各国必须有意识地努力维护,这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然而,这一时代的大多数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假设均势部分是人为的,或者至少是国家和政治家有义务有意识地促进和维护的。^③如果仅仅是均势就能给小国带来如此程度的安全,并有效地捍卫它们自然存在的权利,那么这就是国际关系中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一种凌驾于小国和竞争国利益之上的利益。所有的政治决策让位于维持可行均势的压倒性需求。维护平衡是如此至关重要,统治者有理由食言并无视条约;这样,国家存在的理由将服务于整个欧洲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单一国家的利益。正如个人为了他所属的社会需要,也可能被迫牺牲一些个人财富一样,一个统治者有理由被要求为了整个国家制度的利益而放弃领土,甚至是他曾经拥有

①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pp. 47-48.

② Edwin Van de Haar, "David Hum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 Reapprais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4, No.2, 2008, pp. 225-242.

③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pp. 149-180.

过的领土。到了 1795 年波兰被瓜分,那种均势的道德价值似乎也消失殆尽了,究其原因,这种道德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或者知识界的一厢情愿,均势并不能真正维护小国的利益相反它很多时候正是以牺牲小国利益而运作。

结 语

隐喻将经典力学引入国际关系领域,革新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正如当前许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经典物理学治下的这种本体论存在着很多不足。均势观念和理论还与现实政治之间有着螺旋上升式关系。首先,要肯定均势概念的本体论在 18 世纪得到了根本性变化,即由原来天平上的砝码转变为宇宙间的天体,这使得均势概念更加现代化,但是这些作者无论是说“均势可以阻止普遍君主制”还是对均势进行道德化、科学化,归根结底都是代表了一定的利益,就像推行均势政策的学者大多是英国人,而为数不多的法国均势论者也是国内政治的反对派。这就要求对待 18 世纪均势思潮抱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承认其对于国际规范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保持对其利益本质的审慎。当然,这种批评是以现代人的视角而产生,如果要坚持语境主义的分析,在 18 世纪这种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出现仍然是极具先进性的。“牛顿—笛卡尔式”顿宇宙观的诞生使得人们用“体系”和“引力”的概念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追求一种体系的平衡与和谐。

其次,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种本体论不免发现其问题重重,存在的许多缺陷,但 18 世纪宇宙学与均势隐喻的互动发展让“体系”“结构”进入国际关系中,并影响了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无论其缺陷如何,也反映了启蒙运动最具建设性的一面——它对科学的信念,以及对人类最终控制自己的环境和未来的能力的信念。彼时的学者学贯古今、文理融通、学思精深,所体悟的知识多为立体的而非割裂的,因此,他们的学科交叉和融通更加灵活,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引进其他学科的新理论所带来所谓的各种“革命”,与前人相比难免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在当前许多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用天平的模型来解释均势的概念,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均势隐喻,按照均势隐喻的演进来看,应该探索更多视角来理解均势和国际关系,以跨学科的方式推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